CEA CONSULTING

2020年渔业改进项目全球回顾

总结报告

目录

关于本报告	1
2020年总结	2
模式的演变	5
进展、影响与有效性	7
渔业管理	11
市场激励	12
社会和商业改进	15
结论	18
参考文献	19

(封面) iStock / JannHuizenga

关于本报告

2019年1月至12月，加州环境协会暨CEA咨询公司（下文简称CEA）对渔业改进项目（FIP）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本报告对这项调查的结果进行了总结。此前关于FIP项目的研究依赖于对公开数据的案头研究，或对FIP项目的个案研究。CEA则回顾了现有的经过同行审议的灰色文献，开展了239次关键知情人访谈，走访了11个国家的28个FIP项目，调查了53家海产品公司，并进行了一系列原始数据分析，力求理清该领域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份总结大致了解FIP项目当前的状况，并为全球开展FIP项目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抛砖引玉，推动围绕可持续海产品的未来及其带来的联合效应展开讨论。

报告总结了针对五个核心研究问题的观察和结论：

- FIP项目的进展、影响和有效性受哪些因素影响？
- FIP项目如何对资源进行投入？
- FIP项目的市场激励因素有哪些？
- FIP项目如何推进渔业管理？
- 除环境外，FIP项目还试图促成哪些方面的改进（如社会、商业）？

关于作者

本项目的主要调查人员有CEA的Max Levine、John B. Thomas、Sydney Sanders、Michael F. Berger、Antonius Gagern博士以及Mark Michelin。此外，还得到了国际迁移政策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的Jacqueline Berman博士、蓝测量（Scaling Blue）的Jesse Marsh、阿诺瓦食品（Anova Food）的Helen Packer、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James Sanchirico博士等四位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的支持。本研究及报告由大卫和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以及沃尔顿家族基金会（Walton Family Foundation）联合委托开展。任何关于本报告的问题或评论，可联系 fips@ceaconsulting.com。

免责声明

本报告之发现及结论均为CEA的解读，并不一定代表研究资助方或相关专家的观点。如中、英文两个版本有任何抵触或含糊之处，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更多关于本报告及CEA 2015年FIP项目全球回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报告：

→ **2020年渔业改进项目全球情况回顾**
OurSharedSeas.com/FIPReview

→ **2015年全球渔业改进项目回顾结果总结**
OurSharedSeas.com/FIPReview-2015

报告提供英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和印度尼西亚文等多种版本。

2020年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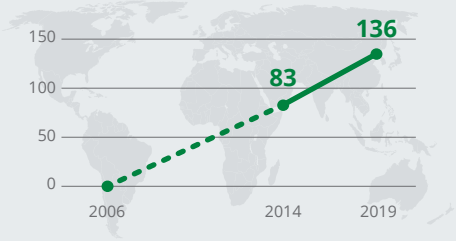
FIP项目的实施在持续壮大和演变。FIP项目简单、可复制，适用于地理、治理、文化和生态系统环境各异的渔业环境。目前，FIP项目涉及各大洲渔业的所有主要海产品。2014年至2019年间，每年开展的FIP项目数量从83增长至136。[1]全球渔获量的近十分之一来自有FIP项目参与的渔业，而且这类海产品正在走上消费者的餐桌。

如今FIP项目的全球格局与五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FIP项目在数量和范围上均有所增长。据CEA估计，自2006年这一模式创建以来，已经推出270多个FIP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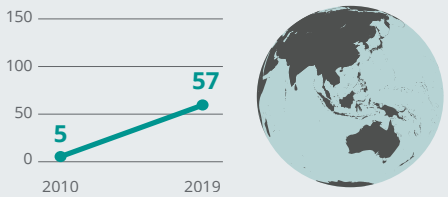
目前正在开展或已成功完成的项目有155个。

全球范围内处于活跃状态的FIP项目数量持续增长，从2014年的83个增至136个。



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在美洲和亚洲。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一直是FIP项目最集中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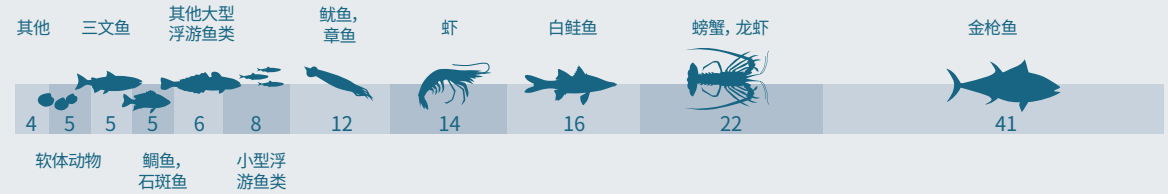
FIP项目数量在亚洲增长迅速，10年前仅有5个，而如今，该地区已经有了57个正在开展或已完成的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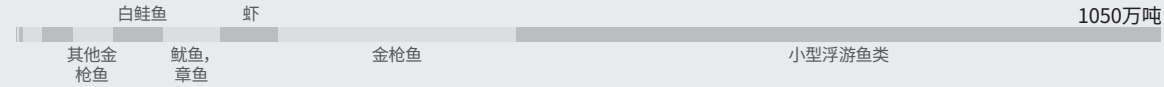
FIP项目参与的渔业活动涉及所有主要海产品。

FIP项目最常涉及的品种有金枪鱼、白鲑鱼、螃蟹和虾。其中，正在开展或已完成的项目中，金枪鱼项目占到25%，而章鱼和鱿鱼等相关的FIP项目则在2015年才首次推出。

FIP渔业数量（按物种分类）



参与FIP项目的海产品总量（按种类划分）



1. CEA咨询公司，《全球渔业改进项目回顾结果总结》，2015，https://www.ceaconsulting.com/wp-content/uploads/Global-Landscape-Review-of-FIPs-Summary.pdf。CEA估计，截至本报告撰稿时，至少还有40个自行申报的FIP项目未向渔业进展（FisheryProgress）报告。这些项目大多既不寻求国际市场认可，也不会对FIP项目或买方构成合法“漂绿”的风险。

FIP项目实践者的角色正在演变。

许多FIP模式的最初架构者已经将工作重心从项目实施转为向全球FIP群体提供更多技术支持。例如，可持续渔业伙伴关系（Sustainable Fisheries Partnership，简称SFP）和海洋成果（Ocean Outcomes）都已经将大部分的项目实施工作交给行业或当地的合作伙伴来完成。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虽仍倚重这一工具，但正在重新研究如何让其在不同国家，以及面对各种环境威胁（如气候变化）时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目前，海产品公司运营的FIP项目数量比其他任何第三方都要多。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项目实施方都得到了海产品公司的支持。通过供应链圆桌会议支持FIP项目的供应链公司数量是2015年的两倍。

当地非政府组织正逐渐调整自身的渔业工作以适应FIP模式。仅墨西哥就有十几个项目是由Comunidad y Biodiversidad A.C. 和Comunidad y Biodiversidad A.C. 等当地组织领导的。这些组织虽然在社区渔业改革方面经验丰富，但在开展FIP项目方面仍是新手。近期，FIP项目还被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国际、美国环保协会和海洋管理委员会（MSC）等一些知名海洋保护组织纳入他们的工作方法之中。

2015年以来，FIP项目的实施一直随着应急战略和社会热点而改变。

“目标75”（Target 75）[2]是可持续海产品市场行业使用的一种组织框架。2017年，可持续渔业伙伴关系（SFP）发布了一份海产品市场的短期愿景，呼吁海产品市场通过让更多的渔业部门参与进来，使可持续采购成为一项行业标准，以及如何以此为目标而努力。这或许是唯一一个旨在帮助海产品行业系统识别并实施FIP项目的战略规划。可持续渔业伙伴关系的供应链圆桌会议促进了该战略的实施。

全球海产品市场战略和各个国家的战略不谋而合。过去，这两种渔业改革战略即便不是相互冲突的，也是各自独立的。过去5年间，FIP这类基于市场的干预措施逐渐认识到，政府的直接参与，以及为渔业管理能力提供支持才是成功的关键。在主要生产国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牌保护组织也一直在招募海产品行业的支持者，并在工作中引入了市场工具。海产品解决方案保护联盟（Conservation Alliance for Seafood Solutions）的《2020-2024战略报告》最能反映这一趋同的态势，报告中承诺将致力于“协调成员采用基于市场的治理方法。”[3]

一些FIP项的实践者正改变重心，推动国家和社区一级的参与。FIP项目不断努力推动治理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的渔业部门朝着可持续的方向改进。实践者看到了这一共同的挑战，但通常会得出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些人认为一个海产品物种或国家的FIP利益相关方需要联合起来集体发声，推动政府解决影响所有渔业的普遍问题。还有一些人则认识到，必须更加明确地让渔业社区参与进来，并且认为社区成员应该以更加直接、显著的方式参与其中。最终这两种方法可能都需要，但仍反映出的FIP实施方法的截然不同。

将社会和经济尺度纳入工作计划的FIP项目虽然不多，但数量在不断增加。开展FIP项目的社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增加改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内容对于鼓励渔民社区的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之所以要将更广泛的问题纳入解决范畴，其背后有两种不同的推动因素。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实现环境目标的一个方式，认为通过解决社会和经济需求可以对利益相关方起到短期激励的作用，让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环境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存在的不足都需要得到解决，无论FIP项目在水域的影响如何，渔业部门社会状况的提高也是项目的成功所在。

2. 对于这一目标，SFP项目致力于确保关键行业的全球海产品产量至少75%是可持续的（例如，通过MSC计划认证或SFP指标体系中绿色清单认证）或进行定期的可验证的改进。
3. 海产品解决方案保护联盟，《战略计划：2020-2024年》，2020年1月，http://solutionsforseafood.org/wp-content/uploads/2020/01/Alliance-Strategic-Plan-2020-2024.pdf

目前针对FIP项目有效性提供洞见的有以下两个新的公共数据平台。

它们分别是鱼类选择（FishChoice）的渔业进展（FisheryProgress）以及华盛顿大学和可持续渔业伙伴关系（SFP）的渔业改进项目数据库（FIP-DB）。这两个平台为企业、环保人士和研究人员提供全球FIP项目状况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在五年前是无法获得的。FIP-DB是一个静态数据库，渔业进展则定期对全球大部分FIP项目的数据进行更新。一份经同行审议、采用FIP-DB数据得出的分析认为，与没有开展FIP项目的渔业相比，开展了FIP项目的渔业更有可能在渔业管理和过度捕捞方面获得改善。[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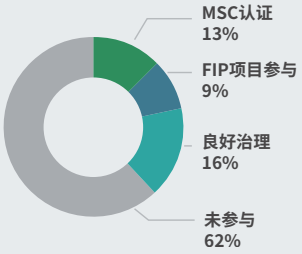
大多数FIP项目都能在启动后的三年内在渔业领域实现一定的改进，但应对一些最严峻的挑战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记录在案的改进中有94%是在项目启动后的三年内取得，但对许多FIP项目来说，长期环境效益仍不明朗。关于水体状况改善（如生物量增加）的报告较少，FIP项目的完成速度也低于最初预期。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欠发达国家渔业改革面临的现实挑战（目前欠发达国家FIP项目数量占FIP项目总量的约三分之二），而不是模式本身的失败。这些挑战包括数据不足、执行能力薄弱以及渔业管理人员的目标存在冲突等。

有观点认为，如果将FIP项目的最低参与年限提高到10年，则更能成功地推动渔业逐步取得认证。Travaille等人（2019）表示，他们的“结果印证了最近的估计，即渔业可能需要长达10年才能达到MSC认证所需的最低可持续性水平。”[5]巴哈马龙虾、厄瓜多尔鲯鳅鱼、圭亚那海棘等，这些渔业都在这一时限内接受了MSC全面评估，尼加拉瓜龙虾也可能同样如此。

全球可持续渔获约占三分之一。这些渔获主要来自具有良好治理能力的地区，即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FIP项目渔获在全球渔获中的占比
（2017年全球渔获量）



80%的已报告的第五阶段（即水体的改善）是解决了当前渔业健康状态的不确定性，而不是FIP活动给水体带来新的改善。[6]

FIP项目报告最重要的改进是第五阶段的改进，反映了渔业目标物种或相关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变化。已报告的第五阶段改进中有80%是在项目启动的头两年。理论上， FIP项目在启动时会通过结构化评估来确定某一渔业领域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利益相关方制定工作计划，然后采取行动改善渔业健康或降低生态系统影响，并加以报告。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部分第五阶段改进在报告的时候，FIP活动还只停留在对当前渔业健康或捕捞实践进行深入了解的阶段，即通过收集新数据（如日志和观察员）、分析先前渔业评估忽略的现有数据、或者采用新方法评估渔业健康相关的技术细节（如采用数据限制方法或新版MSC标准）。对渔业的真实状况有更准确的了解确实有益，但这一阶段所应代表的水体变化则与预期不尽相同。

4. James Cannon等人，《渔业改进项目：十年回顾》海洋政策97（2018年11月）：179–87，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8.06.007。CEA还复制了Cannon等人的方法，并证实了调查结果。
5. Kendra L. Thomas Travaille 等人.，《渔业改进项目相关的关键属性》，《渔业与渔业20-3》，2019年5月：452-65，https://doi.org/10.1111/faf.12357。
6. CEA咨询公司，《全球渔业改进项目回顾结果总结》，2015，https://www.ceaconsulting.com/wp-content/uploads/Global-Landscape-Review-of-FIPs-Summary.pdf。第五阶段指的是水体的改善，例如种群生物量增加、捕捞死亡率降低或者栖息地影响减少。

模式的演变

2015年的回顾报告发表后，FIP格局不仅有所扩大，也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不断变化的市场刺激可以解释为什么FIP模式可以从最初的理论演变成为新的方法推广开来。

初始理论	→ 实践局限	→ 新的途径
短期 **FIP渔业** 买方要求渔场开展FIP项目，从而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持商业关系和市场准入。	· 许多新近参与FIP项目的渔场有越来越多的最终产品进入非参与国或国际市场。 · 非参与国市场需求（如中国）正在取代参与国市场对许多海鲜产品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对某些商品的刺激。 · 许多买方将FIP与认证（即市场准入）相提并论，从而降低了取得正式认证的积极性。 · 企业在可持续方面承担的法律义务有限，劳动法和人权标准的法律责任机制更为健全，可能是更为有力的激励措施。	· **自下而上的FIP项目**可以根据买方需求带来新的商机。 · **社会和商业FIP项目**有额外的行动和目标，能够针对社会、经济和/或商业方面存在的不足带来短期的效益。 · 在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为可持续海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加大对主要国家（如西班牙和日本所做的工作，还有墨西哥和秘鲁的努力）的市场激励。 · **重视非市场效益，**认可和表彰具有自豪感、荣誉感和成就感的优秀实践者。
中期 **MSC认证渔业** 最初预期是，通过认证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进而获得溢价，让渔场受益。	· 全球表现最佳的渔场中有12%以上获得了MSC认证。获得认证的渔场数量逐渐增多，而余下的符合认证条件的渔场也越来越少。 · 并非所有商品和产品都能通过取得MSC认证获得溢价。但就获得市场准入而言，往往通过参与FIP项目就可实现。 · 基于全球可持续海产品倡议（Global Sustainable Seafood Initiative）基准或海产养殖认证饲养标准的其他形式的认证越来越受到买方的认可。 · MSC和其他可持续海产品认证并非适用于所有市场。认证对于渔场而言，价值几何取决于其出口目的地。	· **“目标75”**力求让占绝大多数的表现处于中位的渔场（而非最佳实践者）将追求可持续性作为常态，同时抑制落后渔场。 · **追求其他最终目标，**例如与渔场相关性更高的其他认证和评级（如负责任生产认证IFFO RS、公平贸易认证Fair Trade、海产品观察黄绿标签Seafood Watch yellow/green）。 · **推广与FIP类似的新型干预措施，**如亚洲海产品改进合作（Asian Seafood Improvement Collaborative，简称ASIC）。 · **海产品行业的社会责任正在迅速发展，**应对渔业部门人权和劳动条件问题的组织就有40多个。这些组织开展的很多工作都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
长期 **可持续渔业** 理论上讲，可持续渔业将为上至生产者、下至终端买家在内的整个海产品供应链带来所需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	· 单靠环境可持续性可能无法为供应链上的参与者创造足够的价值。该模式最初构建时也不是以生产者的福利作为明确目标的。 · 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利益分配既不公平、也不平均。这一认识促使海产品行业改革采用了另一种以价值为导向的方式，激励人们努力改善生产者及其社区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 **将持续朝着可持续渔业的方向努力**作为主要的长期动力和共同目标。 · **对人类福祉的考量正在增多。**目前尚未清楚这一趋势可能会给可持续海产品带来怎样的改变，但重新调整干预措施，完全以人类福祉为明确目标，则背离了最初提出的长期愿景。

理解激励措施是了解行为变化的关键。

可持续海产品行动的目标是扭转整个海产品行业的生产行为，更多地开展环境责任实践——从生产者，沿着供应链到零售商，再延伸到消费者。理解激励措施是了解行为变化的关键。十多年前，当沃尔玛等大型食品杂货零售商需要一种过渡模式来履行他们的可持续海鲜承诺时，MSC认证对大多数渔场而言显然是遥不可及的。最开始，全球可持续海产品行动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推动渔场参与、并鼓励他们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措施。理论上讲，效益越多越有助于鼓励渔业利益相关方改变行为，依照一套业绩标准不断进步。但实际上，激励机制存在不足，这为制定和尝试其他激励机制创造了机会。

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不断变化。

虽然对可持续海产品的需求决定着FIP模式的演变，但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通过协助塑造买方需求、扶植新的方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私营部门在资金和运营上越来越多地参与实施传统供应链驱动（即自上而下）的FIP项目。非政府组织大多本着慈善的宗旨在不同市场和治理背景下对FIP模式展开实验，特别是那些没有国际供应链伙伴（即自下而上）或希望将社会和/或经济元素纳入工作计划的项目。这种方法虽然支持了创新，但也让全球的FIP项目实践者感到困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失望，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某些项目能得到直接补助资金，有些却不能。

将价值取向转向人类福祉能否推进可持续海产品这个终极目标?

可持续海产品业内也在探索围绕人类福祉所受影响存在的问题。业界一些成员一直在研究以市场为基础的保护方法所蕴藏的价值和假定，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当初开发FIP项目的目的是保护和恢复全球渔业的生态可持续性，而不是收集数据，或是解决渔业内部的社会经济动态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因此，FIP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动态，如此一来就增加了对人类生活造成意外影响的潜在风险。FIP也可能错失机会，无法从社会、文化、卫生、治理和经济等人类福祉的角度提高资源开发效率。

FIP项目实践者们正在思考他们自身具有的指导价值，以及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海产品行业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考量纳入自身工作。大量的不协调和被动性的工作（如新的工具、框架和方法）被引入来尝试解决渔业的人类福祉问题。截至目前，海产品行业对此基本上仍保持沉默;许多传统FIP项目实践者不认为“社会”问题是自身能力所及、或工作范围内有必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基金会战略也尚未针对这些新的途径作出调整。但去年的工作表明，行业、实践者和基金会领导中有越来越多的先行者正准备着手在近期解决这些问题。

“FIP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而是渔业需要做出哪些改进的问题。如果你面临巨大、复杂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就算有很多钱，也不会有进展。”

——业内重要人士，墨西哥

进展、影响与有效性

一些利益相关方无法控制的因素会影响FIP项目的成功与否（或者说外界认为的成功与否）。这些因素在评估FIP项目的有效性时应明确予以考虑。

2015年，CEA寻求加深对FIP项目实施情况的理解。通过当时的研究，CEA提炼出四个一分为二的特征，以及通过方法和原理对项目加以区分的变革理论。[7] 这些框架虽然有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FIP项目的工作环境。

经验分析、专家意见和实地考察都表明，政府渔业管理能力决定着完成FIP项目所需的时间。一个FIP项目如果能够在一个正常运作的渔业管理系统中推动管理变革，项目进展就会更快;可如果一个项目必须支持创建一个更好的管理体系，或推动其完善，或者是需要越俎代庖，代替正式的管理体系发挥作用，项目的进展就会更慢。此外，FIP项目如果处在一个相对健康的渔业环境中，那么只需做出少量改变就能获得认证，因此完成更快，效率也更高。这些因素与FIP项目的结构、供应链影响力、利益相关方参与方式或项目资金到位程度无关，但会影响FIP项目推动水体变化或者渔场达到认证水平的能力。

FIP项目实施的方式也很重要，但项目启动之初很难对领导力和影响力进行评估。实践者和业内重要人士经常把个人领导力说成是FIP项目绩效好坏的重要原因，但也许除了与相关渔业管理人员先前的关系之外，很难从一个成功的FIP项目领导身上提炼出天生具备的一些特征。在项目启动之前就了解哪些利益相关方能够影响渔业管理人员或社区领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让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则是一个FIP项目更加有效的关键。

克服欠发达国家存在的挑战：

尼加拉瓜眼斑龙虾FIP项目进度虽然缓慢，但却按照行动计划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渔业取得了重大的改善……没有一项指标低于最低合格线（<60），”（FIP行动计划2018，MRAG）。

眼斑龙虾FIP项目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个原型项目。这个FIP综合项目以出口为导向，主要服务于欧美，但输出到亚洲的比例越来越大。尼加拉瓜渔业署（INPESCA）有意愿、有能力加强管理、监测及执法，这是这个FIP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INPESCA采取了诸多举措加强龙虾渔业的管理，包括强制要求修改渔具，加大对渔获登陆点和主要公路沿线出口关卡的检查力度等。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其他国家。该项目与邻国洪都拉斯成立了一个双边工作组，协调改进工作。洪都拉斯是尼加拉瓜以外唯一拥有工业龙虾捕捞船队的中美洲国家。INPESCA工作人员还在中美洲其他眼斑龙虾捕捞国开展能力建设培训。而且尼加拉瓜还大幅减少了在捕捞海域作业的工业龙虾捕捞艇的数量。由于工业潜水捕捞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很高，这也是龙虾渔业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7. CEA咨询公司,《全球渔业改进项目回顾结果总结》，2015, https://www.ceaconsulting.com/wp-content/uploads/Global-Landscape-Review-of-FIPs-Summary.pdf。

影响FIP项目进展的因素

无论FIP项目实施情况如何，外部的渔业动态因素都会影响项目表现：

政府的渔业管理能力

执法：政府的执法能力往往是渔业恢复和有效管理面临的最重要的障碍。

稳定性：重要管理机构的人员流动性越高，外部利益相关方推动改革的难度就越大。FIP项目切实提供了一个维护系统知识的外部机制，从而有助于在人员更迭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连贯性。

管理目标：渔业管理机构可能会优先考虑可持续性以外的其他方面（产出目标、生计），从而增加了FIP项目实现环境目标的难度。

科学管理：制定捕捞限额的过程如果不科学，过度捕捞问题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就更大。

管理范畴：需要跨辖区协调管理的渔业更为复杂，需要的时间也更长。

渔业初始状况

渔业状况：初始状况较好的渔场进展往往更快。2015年，CEA将这些渔场认定为“优秀”渔场。

评估单位大小：如果评估单位足够小，则某些MSC绩效指标默认为及格分，从而降低了项目完成难度。

目标物种

生命历程：Travaille等人（2019）解释称，某些种群更适合基于生命历程特征的FIP项目。FIP项目目标物种如果成熟期较长，那么其恢复起来也更慢。他们还发现，类似虾和小型中上层鱼类这种高繁殖力的物种可能比较有挑战性，原因在于其种群的自然增长量每年差异极大，很难通过长时间的测量来确定FIP项目的进展。

捕捞船队类型

工业 VS 手工：与手工捕捞相比，工业捕捞船队更加稳定，参与和监管的人数较少，报告进展也比较快。在欠发达国家，捕捞船队类型似乎更为重要。在这些国家，工业化渔业的FIP项目会比手工渔业更频繁地报告项目取得的改善情况。

影响FIP进展的因素

具有以下关键属性的FIP项目可能更加有效：

领导力

与渔业管理人员或机构先前就已建立的关系：政府往往需要进行一些变革来帮助FIP项目取得成功。FIP项目领导和政府工作人员先前就已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往往有助于项目取得成功。

在技术层面上对FIP项目流程、目标标准（如MSC、IFFO-RS、海产品观察）和市场动态有着透彻的理解：FIP项目领导对项目目标了解越深入，就越有能力指导参与者实现目标。项目领导对供应链动态关系的了解能够帮助他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引入其他的市场利益相关方，协助完成项目。

本地化：FIP项目的当地领导人能够更快地建立信任，更能专注于项目的成功，对项目背景的了解也更深入，并且是信息提供者重点提到的一个成功关键因素。

利益相关方管理

让“合适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FIP项目的利益相关方群体需要将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与项目目标统一起来。一个FIP项目如果需要改善国家层面的管理，就必须有足够的行业影响力或政府关系，来稳步推进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开展的活动。利益相关方影响力较小的FIP项目可以依靠直接参与活动来作出改变，但不应期望推动更大规模的变革。

努力程度

连续性：成功的FIP项目实践者会连续工作数年，保持项目势头，让利益相关方感受到项目的始终如一。

资金充足：资金是一个制约因素。项目的持续开展需要有足够的资金维持，这对取得进展至关重要。

第三方实践者：专注于FIP项目实施的能力是更加快速地取得进展的关键。

市场杠杆

供应链结构：环节较少、较为直接的供应链更容易传递改革需求。纵向一体化的供应链最为有效。供应链参与者越多，即使高度统一，向需要改变行为的生产者传递明确信号的难度也会越高。

目标市场：相比为没有作出可持续承诺的市场供货的渔场，那些将大部分产品销往践行可持续承诺的市场的渔场进步动力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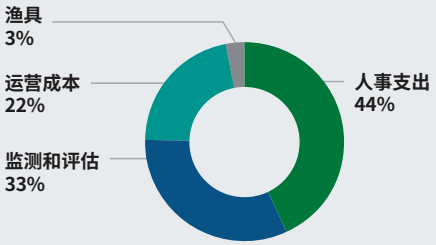
然而，一些影响因素是可以预先确定的。某些环节较少、更加统一或纵向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供应链更能有效地传递买方需求和推动FIP项目进步。同样，FIP项目利益相关方投入更多努力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获更大的进步。FIP项目的结构（如综合项目vs基础项目[8]）、预算和领先实践者都可以作为项目工作的间接衡量因素。许多成功的FIP项目都有这些共同的特点（例如摩洛哥沙丁鱼、厄瓜多尔鲯鳅鱼、尼加拉瓜龙虾、中西太平洋金枪鱼）。

一个国家的渔业管理能力是决定FIP项目进展速度和完成时间的关键因素。数个研究尝试着确定国家环境对FIP的影响。[9] CEA的研究结果证实，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对FIP项目的进展有重大影响。渔业管理指数（Fisheries Management Index）[10]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渔业管理能力。这个指数可以很好地预测FIP项目能否取得更高的效益。结果表明，在渔业管理能力薄弱的国家，FIP项目带来中短期变化的难度更高。

作为渔业资源管理的指导因素，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会影响FIP项目的实施。欠发达国家开展渔业管理，可能至少有部分是出于以下原因：最大限度增产，促进经济增长（如印度尼西亚和秘鲁）；利用渔业政策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现象（如南非）；提高当地粮食安全（如印度、孟加拉国和莫桑比克）；作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如塞内加尔和墨西哥）；或者为了创汇，最大限度地汲取租金（如《瑙鲁协定》缔约国和西非国家）。生态的长期可持续性可能并不是这些地区的渔业管理目标。与政府管理优先事项保持一致——或者明确打算改变优先事项——的战略限制了FIP项目让政府机构有效参与进来的能力，因而降低了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而这一点似乎通常会被忽略。

典型的FIP预算解析：

FIP项目的人事支出占总预算的近一半（44%），这说明个人在推动多利益相关方进程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事成本包括实践人员、顾问、日常开支和战略发展。



监测和评估成本包括渔场的研究和分析、根据MSC绩效指标进行年度评估、以及监测活动。

运营成本包括运营多利益相关方进程所需的标准支出，包括差旅费、举办研讨会和会议以及利益相关方外联的费用。

FIP项目用于调整或改造渔具的预算占非常少的一部分，例如将延绳钓中的丁字钩改为回旋钩。

CEA分析了25个不具名的FIP项目得出这份预算细则。

8. 海产品解决方案保护联盟，《渔业改进项目支持指南》，于2019年8月修订，http://solutionsforseafood.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FIP_report_screen-final_revised_september.pdf。
9. G. S. Sampson等人，《确保发展中国家供应可持续海产品》，《科学》348-6234，（2015年5月1日）：504-6，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a4639; Kendra L. Thomas Travaille等人，《渔业改进项目相关的关键属性》，《渔业与渔业20-3》，2019年5月：452-65，https://doi.org/10.1111/faf.12357; Karen T. Villeda，“基于市场解决方案渔业：衡量渔业改进项目的全球效益”（华盛顿大学，2018年），http://hdl.handle.net/1773/43084。
10. Michael C. Melnychuk等人，《渔业管理对目标物种状况的影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14-1。（2017年1月3日）：178-83，https://doi.org/10.1073/pnas.1609915114。

与实践者的组织关系相比，强大的个人领导力也许更能推动FIP项目的成功。实地考察和业内重要人士不断强调个人致力于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性。这与我们回顾共同管理干预措施的相关文献时得到的结论相一致。[11]这些个人要么是先前就与渔业管理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的当地人，要么是能够从技术角度充分理解FIP和MSC项目要素，并有多年渔业工作经验的前政府官员。

参与FIP项目的渔场一般都会有所改进，但目前没有足够数据证明这些渔场与没有参与FIP项目的渔场相比是否取得了更大的改进。Cannon等人（2018）发现，FIP项目参与的渔场，其渔业状况总体上都得到了改善。[12]CEA尝试检验FIP项目与管理改善和种群健康之间是否存Cannon等人所说的在因果关系。但由于非FIP项目渔场的相关数据实在有限，无法得出明确结论。缺少非FIP项目渔场的数据，就无法对FIP项目和非FIP项目渔场进行比较。因此，需加大投入，完善数据，从而了解FIP项目是否是促成这些改进的原因。

政府参与：

厄瓜多尔鲯鳅鱼FIP项目与厄瓜多尔政府合作，共同改进渔业管理。

为响应美德两国大买家的需求，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09年启动了这个FIP项目。该项目在推动厄瓜多尔的鲯鳅鱼渔业管理完成重大改革之后，于2019年结束。世界自然基金会自项目启动之初便和管理机构（SRP）密切合作，将所有FIP活动都集中在政府之内。双方合作制定了与FIP工作计划完全一致的《国家行动计划》，并为政府开展这些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该项目最终改善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包括可溯源性和卫星监测系统），建立了船上观察员计划，修订了渔业管理条例，包括设立禁渔期和最小可捕规格等，并对国家和国际鲯鳅鱼管理做出了一系列变革。自此以后，厄瓜多尔其他FIP项目都开始以《国家行动计划》为基础制定FIP项目工作计划，其中就包括小型浮游鱼类FIP项目和金枪鱼FIP项目。

该FIP项目已经进入MSC评估。专家预计，鉴于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对人工集鱼装置（FAD）和种群评估的持续关注，项目会通过认证，但有附带条件。该项目成功推动了手工渔业的重大变革，可能会成为拉美及其他地区地手工渔业FIP项目学习的典范。

“FIP项目的行业领导力[及]其所有权对项目进展至关重要…从长期融资角度来看，这是必须的。”

——非政府组织关键信息提供人，美国

“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让政府参与这一进程。比较厄瓜多尔和秘鲁的鲯鳅鱼FIP项目，主要差异在于厄瓜多尔当局的参与程度…这一做法获得了回报，因为（厄瓜多尔的FIP项目）即将进入（MSC）全面评估。”

——非政府组织重要人士，秘鲁

11. NicolásL. Gutiérrez等人，《领导力、社会资本和激励措施推动渔业成功》，《自然》470-7334（2011年2月）：386-89。https://doi.org/10.1038/nature09689。
12. James Cannon等人，《渔业改进项目：十年回顾》海洋政策97（2018年11月）：179–87，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8.06.007。

渔业管理

提高渔业管理的有效性对可持续渔业至关重要，政府参与几乎是所有FIP项目成功的必要条件。

大多数FIP项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所做出的改变。管理国家自然资源是政府的责任，但FIP项目所在的许多国家，目前在渔业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还不足以维护资源。FIP项目实践者逐渐形成共意，FIP项目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为渔业管理提供了有效地补充，同时也必须帮助推动政府做出改进。FIP项目采用了几种不同的策略鼓励政府参与，但似乎没有哪一种策略具有一贯的优势。如果政府利益与FIP目标一致，并且有能力采取行动（如厄瓜多尔、摩洛哥、尼加拉瓜），则可以取得显著进步。FIP目标与政府渔业目标不一致或政府管理和执法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进展通常局限于项目参与者依靠自身力量能够获得的改变，对水域的影响通常也很小。

FIP项目可以通过提供额外的资源和能力，从某些方面为渔业管理提供有效补充。FIP项目通过开展渔业研究（如数据收集、种群评估、为管理政策提供科学建议）、制定政策（如制定渔业管理和恢复计划）、启用监测装置（如扩大观察员的覆盖范围、采用电子监测、完善文档管理）、以及提供拓展服务（能力建设和社区参与），可以成为渔业管理人员的补充，有时候甚至是代替他们的角色。这些发现与FIP项目和渔业治理相关文献中得出的结论相一致。[13]

规范落实法规和可持续标准或许是渔业管理人员最重要的职责，而FIP项目在这方面能力有限。FIP项目无法持续有效地代替政府履行以下两项基本职能，否则遭受过度捕捞的渔业可能就无法恢复：FIP项目无法使用政府的新政策，无法迫使非参与者执行规则和条例。如果FIP项目能够让影响某个渔场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那么也有可能出现例外。例如，鉴于手钓金枪鱼渔业的独特性质、小岛屿社区的动态、以及有足够的激励措施确保渔民一直遵循更好的捕捞实践，公平贸易认证和MDPI才能够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的小型捕捞社区中，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代理政府的作用。

什么才是能够推动FIP项目取得成功的“合适的”官员或机构，这是因情况而异的。没有两个国家在机构、责任架构、技术能力、潜在渔业资源、动机、贸易关系或执法能力等方面是完全一样的。此外，CEA还确定了目前参与FIP项目的七类政府实体。[14]了解这些结构对于了解FIP项目能否实现所需的变化至关重要，对渔业管理薄弱的渔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复杂性凸显了人脉关系良好的专职领导对于FIP项目的成功是多么重要。

“我们在FIP项目上的盟友越多越好，这样我们给政府的建议就更有分量。”

——非政府组织重要人士，秘鲁

13. Beatrice Crona，SofiaKäll和Tracy Van Holt，《渔业改善项目作为渔业可持续性的管理工具：全球比较分析》。Sergio Villamayor-Tomas，PLOS ONE 14-10（2019年10月1日）：e0223054，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3054。

14. CEA发现，参与FIP项目的有以下七类政府实体：渔业管理机构;国家海洋研究机构；渔业监测、控制和执法机构；行政规划机构；农村发展机构；军队和警察；多边机构。更多信息请参阅《2020年渔业改进项目全球回顾》报告全文。

市场激励

全球海产品供应链种类非常复杂，既有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又有需要经过十几手交易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松散型供应链。简单起见，本报告将分三个方面对海产品供应链进行分析：终端买家、中间供应链、以及地方产业。

终端买家：

直接面向个人消费者的海产品销售公司（如日杂店、餐饮服务和饭店）

终端买家的需求决定了市场激励机制，促使供应链采取行动，并影响FIP项目的结构和目标。市场准入仍是最突出的市场效益，而可持续承诺决定了谁能进入市场。现在不少例子说明，为了达到买家逐步提高的可持续性要求，FIP项目是如何从一个基础项目升格为综合项目的（如墨西哥湾虾、墨西哥手工捕虾）。考虑到零售商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他们能够制定明确的采购政策并将其不断地传达给供应商。

通过定期与供应商进行沟通，零售商可以加深对FIP项目的直接参与。零售商能够为可持续海产品带来需求，而需求能够促使供应链采取行动，推动创立FIP项目。因而，对于FIP项目来说，零售商的作用是很关键的。然而，一些业内重要人士也表示，除了清楚地表明自身的可持续要求之外，零售商为FIP项目提供的资金有限（也有例外情况）。同时，他们一方面要求供应商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却不要求供应商提供项目参与证明或是确保产品的原产地，并且除了偶尔发布联名信之外，很少直接参与FIP项目。

供应链参与

墨西哥湾虾FIP项目表明商业承诺和供应链参与能够对渔业改进产生有益的影响。

根据买家对供应商和捕捞者参与度的不同要求，墨西哥湾虾FIP项目由原来的一个整体被分解为若干个州项目。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州的FIP项目已经从基础项目发展成综合项目，原因在于当地零售商客户目前的采购政策要求海产品必须经过认证或来自综合FIP项目。业内重要人士对墨西哥湾虾供应链圆桌会议迫使路易斯安那州政府作出必要的政策改革表示赞赏。该州还通过了在渔网上安装海龟逃脱装置、以及更改拖网捕捞时间的改革，并且正在协助开展有关副渔获的研究。这些变化可以让该州渔业进入MSC全面评估。与此同时，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FIP项目却原地踏步，因为当地购买者没有提出类似的具体要求。

“对于那些所谓的基于市场的海产品治理形式来说，零售商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代表着买方对价值链的控制。”

——BUSH AND OOSTERVEER，2019

Simon R. Bush和Peter Oosterveer，《可持续海产品管理》，第一版。（MiltonPark，Abingdon，Oxon；纽约，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9年。系列：地球了望食品与农业：Routledge出版社，2019年），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80429。

供应链中间企业

从主要加工商处购买海产品，然后出售给终端买家的所有企业（如出口商、进口商和分销商）

面对来自消费者的压力，以及出于保障自身供应的需要，供应链中间企业不得不参与FIP项目。根据供应链企业的报告，他们的压力来自供应链两端，但微薄的利润和竞争限制了中间供应商的行动意愿。一些情况下，他们会因为担心完全失去供应而不愿或无法向渔民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进行改革。

大多数供应链中间企业推动FIP项目取得进展的能力并不明朗。只有大宗买家，以及纵向一体化的企业才能发挥实质性影响。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和大宗买家知道自身拥有更大的供应链影响力。一位公司代表告诉CEA，“中间供应商拥有巨大的能力，可以影响当地的供应商，在纵向一体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一家纵向一体化的供应链企业称，“怎样才能激励FIP项目？就是告诉他们，表现好……我们就买得多。”但大多数供应链中间企业却报告称他们感到被边缘化，几乎没有能力促使行为发生改变。供应链企业如果不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就会一直被捆住手脚。

供应链圆桌会议是为FIP项目提供支持的有影响力的竞争前平台。该组织按商品或地理位置组织供应链中间企业参与到项目中去。16个供应链圆桌会议目前参与了全球69个FIP项目。参与供应链圆桌会议的企业从2015年的71家增至2019年2月的151家，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供应链圆桌会议通过让买方有序地参与进来，形成影响力合力。供应链圆桌会议作为组织全球供应链参与FIP项目的途径，在海产品市场行业中也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认可。然而，圆桌会议的活动千差万别。这些会议被广泛看做是为供应链企业提供信息、鼓励其参与的有效平台。一些圆桌会议还为FIP项目提供资金，并协同向FIP项目施压。但就他们这些工作的整体效果而言，负面的看法和正面的看法兼而有之。一位参与供应链圆桌会议的人士称：“供应链圆桌会议组织松散是刻意为之。因为僵化和刻板的组织形式不利于行业发展，”他们的努力程度反映了参与者的意愿，这种参与可能仅限于一年参加一两次通话或会议。

查证产品是否来自FIP项目非常困难，所以很少要求这么做。对于非纵向一体化的海产品企业而言，在没有可追溯系统的情况下确保产品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供应链企业要求提供证据，证明产品来自某个FIP项目具体的参与者，一些企业则只“要求”产品来自FIP项目。但通常而言，除非使用全供应链可追溯工具，否则供应链企业无法查证产品是否来自FIP。然而，FIP项目既非必须、也很少使用此类工具。

商业改进：

为打击低价，美国的FIP项目正在推动一项高价值、低产量战略。对墨西哥湾的捕虾人来说，拖网时间越短，虾的质量越好。同时，缩短拖网时间也降低了副渔获的死亡率。除了墨西哥湾虾，北卡罗来纳州蓝蟹和缅因州蓝贻贝渔业也在努力通过高质量和可持续性在国内市场脱颖而出。

“我对FIP项目感兴趣既是因为可持续资源，也因为（美国市场上）零售和超市的要求。”

——业内重要人士，印度尼西亚

当地利益相关方：
从捕捞到初加工的过程中买卖海产品的个人和企业，假定都发生在当地（如餐饮摊、当地中间商和初加工商）

本国利益相关方是FIP项目有效性和渔业改进的关键。本地加工者距离生产者最近，虽然不能直接影响生产者行为，但他们的活动为水域变化提供了最强烈的信号："（我们有自己的）龙虾捕捞船队，可以要求他们遵守所有规则。我们拒绝在码头购买非法龙虾。"一位加工商解释称。从CEA听说的一些例子来看，政府更愿意从本地行业，而不是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商或大型跨国零售商那里获取可持续性信息。

在当地一些利益相关方看来，改革既是责任，更是机遇。然而，一些人则因为要求他们在通常得不到什么支持的情况下承担渔业改进的重任而一直感到"不公"。而且，如果进口或出口商转而从其他渠道进货，他们也别无选择。尽管各国，甚至各个FIP项目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当地行业不一定会认为终端买家要求参与，是在支持自己。在印度尼西亚，当地业界代表强烈地感觉这是一个挑战：一位FIP项目负责人称，"买方不理解改进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这里。他们也从非FIP项目产地采购，他们不会特意去购买FIP产品。FIP产品的市场溯源工作做得并不好。"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当地行业在市场上的工作缺乏差异性，也缺乏资金支持。当地行业几乎总是希望通过参与FIP项目来获得新的买家、进入新的市场或者是赚取溢价，但鲜少有人能看到除了市场准入和源源不断的客源之外的益处。除了公平贸易认证相关的项目，以及少数公司为了鼓励渔民参与FIP项目而付给他们更高的价格之外，通过FIP项目获得溢价的案例很少。一位FIP项目负责人称，"渔民获得的效益似乎没那么多，这是我感到担忧的一点。效益可能是间接的、长期的，但渔民的期望是短期的。"缺少支持成为一种持续的趋势。

生产者参与FIP进程这件事本身并不多见，但渔民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可持续海产品运动。一些人还把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参加布鲁塞尔和波士顿海产品展（Brussels and the Boston Seafood Show）等活动当做提高自身的机会。五年前，CEA对FIP项目进行实地考察时发现，只有印度尼西亚MDPI/公平贸易认证金枪鱼渔业项目中的渔民了解FIP项目。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我们从很多例子中看到，渔民不仅了解FIP流程，而且主张自己的利益。有些时候，他们不仅积极参与FIP项目，还具有主人翁意识（如智利石蟹项目）。许多生产者表示，参加贸易展和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能够提高意识，从而愿意争取获得认证。

"我们不能等着政府。作为行业，我们需要主动做这件事情。"

——业内重要人士，印度尼西亚

"（FIP的好处是）与其他企业交流，有机会向政府提供资源相关的信息，[以及]教育利益相关方，让他们了解蟹类的可持续性。"

——业内重要人士，印度尼西亚

"FIP项目的许多成本最终落在了供应链上最穷的人身上。渔民付出了时间。就供应链上的资金量来看，这太不公平了。从FIP项目中受益的是出口商和国际买家，而所有的工作都是渔民在做。"

——非政府组织重要人士，秘鲁

社会和商业改进

海产品生产为全球数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食物、福祉和生活方式。但海产品生产也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甚至会侵犯人权。FIP项目很大程度上并未考虑其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维度。

可持续海产品行动正在壮大，纳入了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FIP项目和可持续海产品市场的工作主要侧重于改善环境。业界参与解决资源可持续问题的工作部分动力在于相信保护可以创造长期价值，或者至少是保全长期价值。许多人的隐含假设都是通过提高可持续性创造长期价值对社会整体是有利的。

直到不久之前，海产品市场群体还在怀疑可持续海产品是否对各方都更有益，以及当前或将来利益分配是否会公平。这一范例正受到若干因素的挑战。首先，目前大多数FIP项目都在欠发达国家，而且小规模渔业项目不断增加。因此，这些FIP项目面临着渔业管理目标相互冲突（例如产出、生计、粮食安全和公平）以及改革受价值驱动等问题。第二，主流媒体对海产品行业中侵犯人权事件的报道日益增加[15]。这不仅为人权组织长期致力于解决全球化供应链中侵犯人权问题提供了动力，而且也促使有关方面发起新的行动，确保遵纪守法，纠正已查明的侵权行为。最后，一些老牌海洋保护组织更加明确地将人类福祉作为保护动机，私人基金会也逐渐开始探索如何让资助项目变得更具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我们所说的“社会”是什么意思？人类福祉维度及其与FIP项目的关系

架构图展示了“社会”一词所包含的人类福祉维度。社会成果体现为这些因素的变化。FIP项目历来侧重于通过可持续渔业管理（带*号）创造的就业、物质资产、以及经济财富为人类福祉作出经济贡献。带**号的领域被认为是获得MSC认证需满足的要求（PIs 3. 1. 1. 1 和 3. 2. 2）

文化
- 多样性
- 身份
- 传统知识
- 活动与实践

治理
- 授权与代理
- 当地机构
- **透明度与问责制****
- **权利与准入****
- 参与

经济
- 经济平等
- **经济财富***
- **物质财富***
- 生计
- **就业***

社会
- 教育与知识
- 安全与保障
- 社会资本与凝聚力
- 适应能力
- 基础设施

健康
- 身体
- 精神
- 情感
- 粮食安全
- 与自然的联系

15. Urbina, Ian.，《海洋权益》，《纽约时报》，2015年7月25日，全球。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5/07/24/world/the-outlaw-ocean.html; Hodal，Kate，Chris Kelly和Felicity Lawrence，《揭露：亚洲劳工为美英超市生产大虾》，《卫报》，全球发展版块，2014年6月1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4/jun/10/supermarket-prawns-thailand-produced-slave-labour。

为什么FIP项目要解决人类福祉问题？主动行为 VS 被动反应

被动反应

要向特定买方出售商品或进入特定市场，就必须识别并降低社会风险。

动机：

- 遵守国家劳动法
- 确保遵纪守法
- 公众压力和负面宣传

案例：

太平洋金枪鱼——延绳钓：面对Tunago 61的拒绝释放令，关键可追溯组织（Key Traceability）进行了一项社会审计，并未发现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

OPAGAC金枪鱼FIP项目：为确保符合欧盟法规和国际劳工组织（ILO）良好行为准则180（Code of Good Practice 180），OPAGAC成员已经制定了AENOR社会责任标准，并努力遵守。

主动行为

解决社会问题可以为渔民、社区和企业创造价值。这些激励因素可以推动项目取得进展，并且从道德角度上也应该这么做。

动机：

- 希望获得新市场准入或溢价
- 渴望改善渔民和渔业工作者的生活质量
- 相信解决社会问题可以提高环境意识、加快进步。

案例：

WCPFC手钓金枪鱼：Anova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方面素有“先锋”美誉，他们进行公平贸易认证，并与慈善机构和多边援助机构达成合作。

墨西哥手工捕捞的蓝虾：Del Pacifico海产品公司希望获得市场对其可持续性的认可。首席执行官似乎是真的关心渔民福祉，也可能存在经济动机。

FIP项目不可能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进行；渔业和人类福祉的许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FIP项目可能会对人类福祉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渔业为社会做出了许多积极贡献，包括粮食和营养安全、就业、经济发展和增长、政府收入、社区和社会凝聚力等。[16] 然而，就FIP项目带来的效益以及潜在负面影响而言，我们对FIP项目和这些维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有限的。FIP项目没有收集任何数据来阐明这些问题，关于该话题也没有任何重要的同行审议文献。

从一些例子来看，FIP项目在社会、经济、文化、治理和健康等人类福祉维度上可以带来或积极，或消极，或不合理，或模棱两可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公，以及非关税贸易壁垒似乎是FIP项目给人类福祉带来的最令人担心的负面影响，但该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CEA仅找到了一份关于某个FIP项目相关意外结果的同行评审论文。[17] 通过采访重要人士和实地考察，我们发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记录FIP项目的非生态性影响

除特别标明外，内容均来自业内重要人士访谈和FIP项目实地考察。

积极：

- 生产者所获得的价格上涨
- 获得数据与信息，从而改善捕捞实践
- 知识与环境管理增加
- 政府的关注与资源

消极：

- 非关税贸易壁垒
- 无偿时间
- 生产者获得的价格降低
- 供应链漂绿

不合理：

- 管理改革实施不力
- 加剧过度开发
- 符合相关规格的产品数量减少

模棱两可：

- 利益分配不平等
- 价值链重组[18]

16. Edward H. Allison，《水产养殖、渔业、贫困与粮食安全》，（世界鱼类中心，2011年）。
17. Bailey，Megan，Simon Bush，Peter Oosterveer和Laksmi Larastiti，《渔民、公平贸易以及寻找中间地带》，渔业研究182（2016年10月）：59-68。https://doi.org/10.1016/j.fishres.2015.11.027。
18. Bailey 等人.，2016。

CEA通过渔业进展（FisheryProgress）的自主报告信息，找到了26个寻求解决渔业相关人类福祉问题的FIP项目，其中六个似乎有生产者和社区的实质性参与。[19] 各FIP项目自主报告中关于“社会影响”的报告差异极大，且主要通过渔业进展上的非结构化注释栏进行记录。推动这些FIP项目的似乎有两大主要目标：（1）遵守劳动法，或（2）希望改善人类福祉。针对第一类，明确的目标是满足维护经营许可所需的规定。第二类的侧重点是改善人类福祉，以此作为改善可持续成果的手段，或者改善福祉本身就是最终目标。这些工作大多开展时间不长，基本价值观和目标很少能够做到一致，各项工作也没有协调——即使采用了蒙特雷框架（Monterey Framework）。[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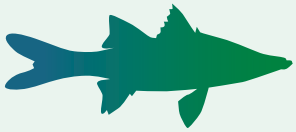
项目仍在初始阶段，现在预测有效性或机会成本还为时过早。鉴于缺乏FIP项目渔业的社会生态动态基线数据、报告不一致、以及大多数工作的制定和实施仍处于早期阶段，可能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开展合理的评估。加大对数据收集的投入，完善在渔业进展上的报告，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FIP项目的人类福祉影响以及如何实施解决方案的了解。

近期，已经有FIP项目将“三重底线”的概念运用到实践中，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改进统一起来，从而对生产者形成短期激励。这个概念正逐渐成为推动行为改变的一种途径。渔业领域几乎没有可供学习的具体案例；只有少数实践者正在试着采用此类模式（如SmartFish和Blue Ventures）。可以采用这类模式的最佳情况是，捕捞方式的改变帮助渔民提高产品价值和总收入，同时降低目标种群承受的压力，或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些情况则是，渔业内部或周边商业或经济的改善（如改善冷链）之后会通过工作计划、协议或合同与其他行动相联系起来，进而提高环境效益。这种情况则更加令人担忧，甚至可能加剧捕捞。采用“三重底线”的FIP项目为吸引当地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提供了一系列诱人的激励措施，但在努力推进保障措施和改革的同时，必须避免给渔业造成更大的压力。

FIP项目如何解决人类福祉问题：

墨西哥那亚力特州湿地红树林生物圈保护区的白锯盖鱼生产

Pronatura Noroeste A.C. 与湿地红树林生物保护区（Marismas Nacionales Reserve）的捕捞合作社密切合作，共同设计并启动了太平洋白锯盖鱼FIP项目。渔民们早就注意到渔获量在减少，但因为他们产量太低，不足以触发CONAPESCA的管理行为，所以他们就启动了FIP项目，设法鼓励政府参与，同时保护资源和管理活动（例如更换渔具、禁渔期和捕捞保护水域）。他们的最终目标之一是在国内出售可持续生产的鱼类，可是为此他们需改善冷链基础设施。渔民定期参与FIP会议和活动，在渔业进展上的“社会影响”一栏中公开报告各项人类福祉目标的进展情况（如基础设施改进）。Pronatura Noroeste A.C.、SmartFish A.C. 和渔业合作社已经成功地为FIP项目吸引到了政府的关注和资源。如今，地方渔业推广小组、农村发展机构和墨西哥国家公园机构三方共同参与该FIP项目的领导。



19. 生产者和社区实质参与的六个FIP项目如下（1）印度尼西亚青梭子蟹；（2）墨西哥手工捕捞蓝虾；（3）印度尼西亚中西太平洋黄鳍金枪鱼；（4）墨西哥那亚力特州湿地红树林生物圈保护区的白锯盖鱼；（5）墨西哥巴伊亚德洛杉矶章鱼；（6）墨西哥北太平洋星云副鲈。选择这六个FIP项目依据的是在相关问题上的基线信息、活动和进展。这些相关问题包括社会问题；成果公开和透明度；依照相关同行评审文献中确定的一项或若干社区有效参与原则，开展社区参与工作；CEA实地考察过程中通过业内重要人士访谈能够独立核实在这些标准上表现。

20. 国际自然保护组织，《推动海鲜行业的社会责任承诺》，2019年3月，https://fishwis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MontereyFramework_CI.pdf。

结论

“FIP项目必须不断演变才能在各种情况下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需要与其他努力和途径相结合来确保更广泛的**影响**。显然，FIP项目有其他途径所不具备地动员和协调私营企业参与保护行动的能力。因此，FIP项目将作为更广泛的保护战略中的一部分继续发挥宝贵作用。”——2015年《渔业改进项目全球回顾》结果摘要

与五年前相比，FIP项目最大的优势和最根本的挑战并无太大差异。扭转全球过度捕捞的趋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FIP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制，动员企业、社区、民间社会和政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由于工作条件更加艰苦，FIP项目面临着巨大的挑战。FIP模式以及多重利益相关方社区正通过调整和演变来应对这些挑战。

FIP模式最大的价值在于其适用范围广、成本相对较低、以及可以大规模部署。许多保护工作都受到了拓展能力的限制，而FIP项目则不然;就地理广度来说，没有哪个渔业改革干预措施能够与FIP项目媲美。这一模式将从时间、支持渔业改革的能力、以及为不同商品和国家带来环境改善的能力等方面来进行评价。尽管有中期迹象表明，FIP项目正在许多困难环境中取得进展，但在推动全球渔业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上，FIP项目可以且应该发挥何种作用，仍是一个问题。

关于有效性和影响力，以及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贯穿着整个对话，对FIP模式提出了疑问。在开展了将近15年之后，FIP项目对水域的影响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表述。这反映出渔业再生的复杂性、治理和市场环境的差异性、以及FIP项目实施方法的多样性。较发达国家的FIP项目取得了更加持续的改进。但随着FIP项目越来越多地推广到欠发达国家——这些地区的FIP项目大多是在过去五年间启动的——这些项目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并且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早期成功，其进展比预期更加缓慢。项目外的渔业动态因素决定了FIP项目取得成功所需的时间，远不止有效实施这一因素。这些挑战激励着实践者在国家和社区层面采取干预措施，并尝试与社会和商业改进相关的新变革理论，从而转移对环境改进的关注。

幸运的是，我们探寻答案的能力、兴趣和支持也今非昔比。全球渔业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学界、民间社会、海产品行业和政府的知识、参与和领导力。为了应对这一挑战，FIP项目群体不断壮大，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领军人为渔业管理出钱出力、献计献策。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在不断增进他们的科学认识和专业技术，而且FIP项目在了解渔业资源的性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行业、多边机构和政府加大投入，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基金会的持续投资，FIP项目实施获得的财政支持也在增加。更多有能力、有领导力的实践者在更多的地方开展工作，为解决新老问题制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确保海产品行业可以为海洋健康和未来人类福祉作出长久的贡献，是越来越多人努力的目标。

这一模式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未来五年是关键。本报告重点介绍了几种最佳实践，包括与政府合作，培养地方领导者并赋予其权利，长期致力于项目发展，不断与那些能够让生产者和渔场的可持续投资获得回报的市场建立联系。建立在有效的基础上是确保可持续海产品投资取得预期成效的关键。随着数据质量和数量的提高，未来五年将是检验这一基于市场的全球渔业改革战略有效与否的首个机会。与此同时，要实现这一承诺，可持续海产品运动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 不论何种产品，不论其所处的地理环境，随时间推移，FIP项目是否都能为其带来水域的变化？如果不能，实施的意义何在？
- 海产品市场群体如何继续在行业和政府之间建立渔业改革的政治意愿？
- 从“不损害”到“提高改善”的过程中，可持续海产品行动在人类福祉方面肩负着怎样的责任，FIP项目在实现这一愿景的过程中又发挥着怎样作用？

我们希望报告能够为FIP项目实践群体和可持续海产品行动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其当前和未来与海洋健康相关的共同目标奠定基础。

“十年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完全集中在环境变化上，但我们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把生计和社区工作结合进来。”

——非政府组织重要人士，美国

“我们应该为工作计划中的所有要素设定切合实际的时间表。确定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固然重要，但这个目标不一定非得是获得认证，也不一定非得是在五年之内。”

——非政府组织重要人士，美国ATES

参考文献

Allison, Edward H. “Aquaculture, Fisheries, Poverty and Food Security.” WorldFish Center, 2011.

Bailey, Megan, Simon Bush, Peter Oosterveer, and Laksmi Larastiti. “Fishers, Fair Trade, and Finding Middle Ground.” Fisheries Research 182 (October 2016): 59–68. https://doi.org/10.1016/j.fishres.2015.11.027.

Barr, Rhona, Aaron Bruner, and Scott Edwards. “Fisheries Improvement Projects and Small-Scale Fisheries: The Need for a Modified Approach.” Marine Policy 105 (July 2019): 109–15.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9.02.053。

Blaikie, Piers. “Is Small Really Beautiful?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Malawi and Botswana.” World Development 34, no. 11 (November 2006): 1942–57.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05.11.023。

Bush, Simon R., and Peter Oosterveer. Governing Sustainable Seafood. 1st ed.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 Series: Earthscan food and agriculture: Routledge, 2019.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80429.

Cannon, James, Pedro Sousa, Isidora Katara, Pedro Veiga, Braddock Spear, Douglas Beveridge, and Tracy Van Holt.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s: Performance over the Past Decade.” Marine Policy 97 (November 2018): 179–87.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8.06.007.

CEA Consulting. “Summary 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Landscape Review of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s (FIPs),” 2015. https://www.ceaconsulting.com/wp-content/uploads/Global-Landscape-Review-of-FIPs-Summary.pdf.

Cinner, Joshua E., W. Neil Adger, Edward H. Allison, Michele L. Barnes, Katrina Brown, Philippa J. Cohen, Stefan Gelcich, et al. “Building Adaptive Capacity to Climate Change in Tropical Coastal Communities.” Nature Climate Change 8, no. 2 (February 2018): 117–23. https://doi.org/10.1038/s41558-017-0065-x.

Cohen, Philippa J., Edward H. Allison, Neil L. Andrew, Joshua Cinner, Louisa S. Evans, Michael Fabinyi, Len R. Garces, et al. “Securing a Just Space for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the Blue Economy.”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6 (April 18, 2019): 171. https://doi.org/10.3389/fmars.2019.00171.

Conservation Alliance for Seafood Solutions. “Guidelines for Supporting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s,” Revised August 2019. http://solutionsforseafood.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FIP_report_screen-final_revised_september.pdf

Conservation Alliance for Seafood Solutions. “Strategic Plan: 2020-2024,” January 2020. http://solutionsforseafood.org/wp-content/uploads/2020/01/Alliance-Strategic-Plan-2020-2024.pdf.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Driving Commitments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Seafood Sector,” March 2019. https://fishwis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MontereyFramework_CI.pdf.

Crona, Beatrice, Sofia Käll, and Tracy Van Holt.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s as a Governance Tool for Fisheries Sustainability: A Global Comparative Analysis.” Edited by Sergio Villamayor-Tomas. PLOS ONE 14, no. 10 (October 1, 2019): e022305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3054.

Friedman, Rachel S, Elizabeth A Law, Nathan J Bennett, Christopher D Ives, Jessica P R Thorn, and Kerrie A Wilson. “How Just and Just How?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ocial Equity in Conservation Research.”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3, no. 5 (May 1, 2018): 053001. https://doi.org/10.1088/1748-9326/aabcde.

Gruber, James S. “Key Principles of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 Synthe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Identified Effective Approaches for Managing the Common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45, no. 1 (January 2010): 52–66. https://doi.org/10.1007/s00267-008-9235-y.

Gutiérrez, Nicolás L., Ray Hilborn, and Omar Defeo. “Leadership, Social Capital and Incentives Promote Successful Fisheries.” Nature 470, no. 7334 (February 2011): 386–89.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9689.

Kaplan-Hallam, Maery, and Nathan J. Bennett. "Adaptive Social Impact Management for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cial Impact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Biology 32, no. 2 (April 2018): 304–14. https://doi.org/10.1111/cobi.12985.

Hodal, Kate, Chris Kelly, and Felicity Lawrence. "Revealed: Asian Slave Labour Producing Prawns for Supermarkets in US, UK." The Guardian, June 10, 2014, sec. Global development.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4/jun/10/supermarket-prawns-thailand-produced-slave-labour

Mansuri, Ghazala, and Vijayendra Rao. "Community-Based (and Driven)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9, no. 1 (2004): 1–39. http://dx.doi.org/10.2139/ssrn.501663.

Melnychuk, Michael C., Emily Peterson, Matthew Elliott, and Ray Hilborn. "Fisheries Management Impacts on Target Species Stat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 no. 1 (January 3, 2017): 178–83. https://doi.org/10.1073/pnas.1609915114.

Merton, Robert K.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no. 6 (December 1936): 894. https://doi.org/10.2307/2084615.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urcell, Steven W., Beatrice I. Crona, Watisoni Lalavanua, and Hampus Eriksson.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Returns in Small-Scale Fisheries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s: A Value-Chain Analysis." Marine Policy 86 (December 2017): 9–16.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7.09.001.

Sampson, G. S., J. N. Sanchirico, C. A. Roheim, S. R. Bush, J. E. Taylor, E. H. Allison, J. L. Anderson, et al. "Secure Sustainable Seafood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cience 348, no. 6234 (May 1, 2015): 504–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a4639.

Schipper, E. Lisa F., Jessica Ayers, Hannah Reid, Saleemul Huq, and Atiq Rahman. 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Scaling It Up. Routledge, 2014.

Teh, Lydia C. L., Richard Caddell, Edward H. Allison, Elena M. Finkbeiner, John N. Kittinger, Katrina Nakamura, and Yoshitaka Ota. "The Role of Human Rights in Implementing Socially Responsible Seafood." Edited by Heather M. Patterson. PLOS ONE 14, no. 1 (January 25, 2019): e021024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0241.

Thomas Travaille, Kendra L., Larry B. Crowder, Gary A. Kendrick, and Julian Clifton. "Key Attributes Related to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 Fish and Fisheries 20, no. 3 (May 2019): 452–65. https://doi.org/10.1111/faf.12357.

Urbina, Ian. "The Outlaw Ocea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15, sec. World,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5/07/24/world/the-outlaw-ocean.html.

Villeda, Karen T. "Fishing for Market Solutions: Measuring the Global Performance of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8. http://hdl.handle.net/1773/43084.

2020年渔业改进项目全球回顾：OurSharedSeas.com/FIPReview. 如有疑问请发送邮件至：fips@ceaconsulting.com